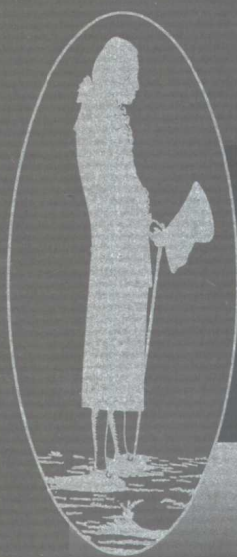


韦卓民：康德哲学著译系列

纯粹

理性批判



【德】伊·康德 著
韦卓民 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纯粹理性批判

〔德〕伊·康德 著
韦卓民 译

曹方久
唐有伯 整理、校订
储昭华

2000年·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粹理性批判/(德)康德(Kant,I)著;韦卓民译.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2

(韦卓民:康德哲学著译系列)

ISBN 7-5622-2187-1/B·60

I. 纯… II. ①康… ②韦… III. 康德 .I. (1724 ~ 1804) - 哲学 IV. 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7186 号

CHUNCUI LIXING PIPAN

纯粹理性批判

◎[德]伊·康德 著

◎ 韦卓民 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洪胜非

封面设计:甘 英

责任校对:张 钟

督 印:方汉江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4 字数:626 千字

版次:2000 年 7 月第 2 版

2000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orman kemp Smith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London,
1929

本书根据英国麦克米伦图书公司 1929 年英文版转译。原著以德文出版,原书名称为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英文版是根据德国哈尔特克纳黑出版社 1787 年出版的第二版译出的。

ALP 161

出版说明

韦卓民，这位博学多才的老一辈学人，在中外哲学史、逻辑、教育和宗教神学等众多领域中都有很深的造诣和丰硕的建树。据不完全统计，他留下的遗著近一百种，达七八百万字。令人痛惜的是：这些价值连城的学术著作中，至今仍有相当大一部分未曾面世。

韦先生平反后，其子宝锷先生于80年代末将遗稿全部捐赠给华中师范大学，希望早日公之于世，以慰父亲亡灵。当时的校领导很重视此事，立即成立“韦卓民遗著整理小组”负责此项工作。90年代初，经过多方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之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整理后的韦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步》两本书出版，受到学术界有关人士的欢迎和好评，被誉为哲学史界的一件大事。随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和作为桂岳书系之一的《韦卓民学术论著选》（1997年），再次引起很大反响，后者出书不久，即告脱销，这更激起大家对韦老遗著早日面世的渴望。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鉴于此，乃下大决心按系列陆续出版韦先生的各种遗著。两年内首先出版关于康德哲学的系列。这真是一桩令人欣慰的大好事，是出版社具有远见的决策。它不仅将有力地推动对康德哲学思想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也必将拉动包括港、台在内的祖国文化界和海外有关人士对韦先生学术思想研究

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韦先生早在三四十年代即饮誉海内外^①，解放后，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在大陆销声匿迹，而在港、台，在域外，对他的研究却始终没有中断。1993年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上，来自美国 and 香港地区的学者均谈到这个问题。台湾一出版商曾拟购买他关于康德译著的版权，香港一位学者曾与华中师范大学联系合作编著他关于宗教神学方面的文集，这充分表明各方对韦卓民学术思想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韦先生关于康德哲学的遗著，数量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质量上堪称上乘。近年来，学术界对此已有所评论。本人谨就与韦先生接触中所见所闻及在整理韦先生遗著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对他在康德哲学研究中的某些情况和特点，作一个粗略的介绍：

第一，西方哲学史上，韦先生着重研究了四个人，即亚里士多德、培根、康德和黑格尔。关于这四位哲人，他均有遗著留下，但花时间最长，耗精力最多的乃是康德。他推崇康德是在马克思以前西方哲学思想发展中一个承前启后的最关键人物。因此，研究西方近代哲学史的人不管谈什么哲学问题，都必须追踪到康德。记得60年代初，韦先生给我们几个中青年教师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时，我隐约地觉察到他讲康德时经常流露出一种激情，这是他讲黑格尔时所没有的。他曾向王元化先生讲过，他对康德的评价远远超过黑格尔。当然，在那“极左”的年代里，他在称颂康德的同时也曾从政治角度斥责过康德几句，这是可以理解的。

① 抗战胜利后，韦先生应邀在美国各大学巡回演讲，介绍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随后集成专著《中国文化的精神》（1947年在纽约出版）。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K·S·Latourette称赞韦先生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业绩时说：“在这方面很少人能 and 韦先生相比，也没有人超越他。”韦卓民是美国“鲁斯教授”这一荣誉称号的第一个获得者。在中国宗教神学界，早在解放前就流行着“南韦北赵”的赞语，意即南方的韦卓民与北京燕京神学院院长赵紫宸同为宗教神学界的台柱，南呼北应，相得益彰。

韦先生于1957年突遭厄运后，从居住几十年的校长楼中移居一间斗室，工资陡降，生活条件急剧变差，但他从容对待，一心扑在康德等人的研究上，到“文革”前，数年内以惊人的速度译出有关康德的专著竟达十部，共三百余万字（同一时期，韦先生还撰写和翻译了四本关于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等方面的著作达一百万字左右）。这是他在康德的研究中成就最多的时期。商务印书馆慕其名向他约稿，由于“文革”爆发，只出版了四部。此后十年，这位耄耋老人在蹲牛棚、下农村、挨批斗、受凌辱等更为恶劣的境遇中仍念念不忘康德、黑格尔，思索不已，笔耕不辍。在那令知识分子濒于崩溃绝望的岁月，他却向同时遭劫的难友说：“要有信心，做学问不能停下来！”表现出一个智者的坚韧与从容，这种精神风貌，实在令人惊羨不已。

第二，他认为，要真正认识康德哲学一定要读原著，特别是他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是康德哲学思想的精髓，故康德哲学又称“批判哲学”。韦先生曾著文专门分析“三大批判”的前提、基础和背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三大批判”中的《纯粹理性批判》是重中之重，代表了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五六十年代，他在“康德哲学讲座”上，主要讲的是《纯粹理性批判》。他着重分析了该书的主题思想“验前综合判断怎样成为可能的”这一命题的理论来源、内容实质和解决途径。他为了帮助国内学子更好、更深入地学习这部名著，决心知难而进，重新翻译这本最难读的书，以克服当时已有的两个旧译本中不实不妥的缺陷。在此前后，他还翻译了两位英国学者讲解《纯粹理性批判》的两本专著，即《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康蒲·斯密）和《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H·J·裴顿）；特别在“文革”前夕，翻译了康德为《纯粹理性批判》所撰的简写本《一切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这都说明了他对这一名著的异常重视和对读者独具匠心的负责精神。

韦先生对整个康德哲学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发掘和研究，寻找这一思想发展的脉络，探讨“批判哲学”的形成背景与条件。他认为在“前批判时期”的著作中已可窥见“批判哲学”思想的萌芽及产生的过程，并确定“批判时期”与“前批判时期”的界碑，从而把两个时期有机地统一起来。根据韦先生的见解，科学家康德是哲学家康德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哲学大师康德，也就没有宏伟的“批判哲学”体系。

第三，韦先生关于康德研究的遗著中，绝大部分是译著。在翻译康德的哲学著作中，他突出的特点是：把研究寓于翻译之中，翻译的过程也就是他的研究过程。多年来我参加整理他的遗著，对这一特点的体会愈来愈深。当年听他讲康德、黑格尔哲学时，对一些重要概念、词语，他总是反复地从结构、词根讲到语义，从英文、德文追溯到拉丁文，那时觉得他有点“咬文嚼字”、“烦琐考证”，后来，才逐渐体会到其中的奥妙和深刻。下面两个例子，从一斑可窥全貌。

例一：上文所说的“验前综合判断”中“验前”一词是康德常用的一个拉丁文“*a priori*”的中译。过去有人曾译为“先天”，韦先生认为是错误的，因为“*a priori*”在拉丁文中并无“与生俱来”之意，康德用这个词更无此意。韦先生在译此词时，先译为“先验”，后一再琢磨，觉得也不妥当。因为在康德著作里多年来已用“先验”来译德文的“*transzendental*”，如果再用它来译 *a priori*，就混淆不清了，于是他反复推敲，最后决定创造一个崭新的词语“验前”来译“*a priori*”。从字面上看，二者似无甚区别，实际上却大不相同，因“验前”更符合康德的原意。韦先生在“文革”中曾专为此写过一篇文稿给我看过，可惜，当时正“兵荒马乱”，我实无心拜读，如今人亡稿失，悔之晚矣。

例二：五六十年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说康德是个反对科学知识的信仰主义者，说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过：“我否定知识，以便给信仰扫清地盘。”韦先生认为，这根本不是康德

的原意，这句话应译为“我要扬弃知识，以便替信念留有余地”（上两处重点都是本文作者加的）。即用“扬弃”代替“否定”，用“信念”代替“信仰”。“扬弃”乃德文“aufheben”之译，其含义较复杂，意指“把某个东西从不属于它的领域中排除，抓住它、保存并加以发扬提高”，英文错误地译为“deny”，国内有人据英文而译为“否定”，跟着别人犯错误^①。

至于“信念”与“信仰”，韦先生说德文“glaube”一词在康德著作中，如果论述一般问题时是指“信念”，而只有专门讲宗教问题时，才意指“信仰”。康德在这里谈的并非宗教方面的问题，故应译为“信念”。可见，康德既未否定知识，又未给信仰扫清地盘。就这样，韦先生更正了两个词语的误译，为康德在中国的“错案”平了反。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正如韦先生说的，他在翻译时“以信为主”，用尽心思忠实于原著，而不像有些译者为了追求“达”、“雅”而不惜损伤原著本意。为了更忠实于原著，他始终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译文，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正如他所说的，做学问一定要有一种“主见不可无，成见不可有”的独立与创新精神，这对一位耄耋老人来说，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第四，韦卓民决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为个人爱好和兴趣而著书立说，乃是为了一个宏伟的工程而奋斗终生的。这个工程就是营造一座宽广而坚实的贯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早在70年前，他已明确了这一奋斗目标。1928年他在伦敦所作的一篇演讲词中声称，融合异质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而在当时的我

^① “aufheben”在各国文字中均无恰当的词来译。抗战时期，我国曾直译为“奥伏赫变”。当时我还在读中学，不解此词的含义，误以为是“辩证”之意，但总还没有误为“否定抛弃”之意。前苏联学者古留加在《康德传》一书中说，俄文有的译为“消灭”，有的译为“限制”，他本人则译为“抬高”。实在有点混乱了。

国，“融合中西文化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而必须的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他还旗帜鲜明地申明：在吸收西方文化时，我们反对妄自尊大的“保守派”，也要反对崇洋媚外的“洋化派”。如果说，解放前他在融合中西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在国内办教会大学、宣讲基督教神学和在国外讲解与介绍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话；那么，解放后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西方哲学史的译介上来了。原来，他研究、译介康德哲学正是站在这个高度来进行的！他常说：我们要在学习西方哲学时做到取长补短，以便更好地发展中国的哲学。他在 50 年代就曾多次说过：在欧洲，有些小国都翻译、出版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大师的“全集”，而我们至今还没有一套，这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他立志要弥补这一缺陷。本来他已具备优越的主观条件，既“通晓古今”，又“学贯中西”，仅外语就精通英、德、法、俄、拉丁文等七八种。可他并不满足，仍自谦说“差距很大”。其实，他是在鼓励我们努力奠定扎实的功底，以铺设他理想中的“桥梁”。他还认为，在介绍西方文化、西方哲学时，要避免把西方的观念“解说成中国的观念”，过分追求中国化、通俗化，以致把人家的文化变质变味。我体会他的意思是，在学习康德这样的西方哲学时，一定要力争学到原汁原味的康德思想；要努力体验领会德国语言的特征及其文化背景；设法逐渐领会康德的思维方式从而弄懂其实质，真正做到沟通中西、优势互补。当然，要真正切实地做到这些，确实是极为困难的。

最后，我代表“韦卓民遗著整理小组”全体成员，由衷地欢迎“韦卓民：康德哲学著译系列”^①即将陆续问世，我们的宿愿

① 本系列含三类内容：一、韦卓民撰写的对康德研究的著作、论文；二、韦卓民翻译的康德原著；三、韦卓民翻译的西方其他学者关于研究、讲解康德哲学的著作。共 18 本（篇），其中有的是经过最近整理遗稿后第一次出版，有的是重印版，有的是修订版，有的是重排版。

得以逐步实现，可以告慰韦先生在天之灵了。在这里，再次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关同志的辛勤劳动表示诚挚的谢意。

曹方久

1999年3月于桂子山

韦译《纯粹理性批判》序言

卓民先生逝世已有十多年了，他是我父亲的同窗好友。少年时父亲曾以卓民先生手不释卷的好学精神勉励我勤奋读书。他说，卓民先生每逢假期都定下阅读计划，读书之多令人敬佩。30年代初，卓民先生在武昌华中大学主校政，那时我刚进中学，适值长城抗战，局势日紧，北平谣诼纷传，一夕数惊，我们举家南下暂避，整整一个暑假就寄居在华中大学校舍中。这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卓民先生，当时他曾利用余暇授我们几个孩子《大学》和《中庸》。暑假后，北方局势暂告缓和，我们全家回到北平，从此一别就是三十多年。60年代初期，卓民先生利用暑假来沪探亲访友，重新见面时我已进入中年。那时我对黑格尔兴趣正浓，提出要向他请教，他慨然应允，并约定通信讨论。他回武汉不久就按约定开始实行了。我们大约十天左右就通一次信，书札来往颇为频繁，十年浩劫曾一度中断，并将那些信件全部销毁，直到1973年才又继续通信。这些信我保存下来了。几年前，我曾从中选出几封以《关于黑格尔〈小逻辑〉一书的通信》为题，发表在《上海师大学报》上，以表示我对卓民先生的悼念。

卓民先生素重康德，他曾向我谈过，他对康德的评价远远驾凌于黑格尔之上，并要我攻读康德著作。解放后，他的近三百万字的译著，其中有关康德的就占了绝大的比重。他译著的康德著作，就国内来说，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在质量上也堪列上乘，比如，《判断力批判》这部书的上卷原是由别人译述的，后来出版社改请他续译下卷，就是因为编者认为他更能胜任的缘故。他早年留学美国，在哈佛获硕士学位。后又留英，在霍布豪斯门下就读，其时，他遍历欧洲几家著名大学深造，历时数年，得博士学

位。他不仅精通英、法、德、俄诸语种，也精于拉丁文。这对他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极有裨益。他不是那种偏执一隅之解的学者，在学术上仅做一家的功臣，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拘囿在狭窄的范围内。他学贯中西，深知融合古今，触类旁通的重要。他生前曾向我说过，他留学英国时，打算钻研佛学，曾向一位年老的英国女专家请教。当他得知，欲通佛学，须懂巴利文，而学这门古文字又非三五年不可，才废然而止。尽管如此，他还是读了不少汉译梵典，并与我国佛学专家结交。我认识熊十力先生并向之请教，就是经卓民先生介绍的。卓民先生也精于黑格尔哲学，晚年撰《黑格尔小逻辑评注》，此书包括部分重译、注释、评论，约七十五万言。他逝世前估计至少已完成三十余万字。他逝世后，翰伯正主持商务工作，我曾向他呼吁，收集遗稿出版，以嘉惠后学。可惜不久翰伯即染病瘫痪在床，陈原同志得知此事后向我函询，但因不知遗稿下落，事遂告寝。我为此一直深感遗憾，现在华中师范大学专门成立了卓民先生遗著整理小组，筹划陆续出版先生遗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等十种左右，上述《评注》也列入计划内，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

我和卓民先生通信时，常提出一些疑难问题向他请教，有时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请他指正。他的复信往往对所涉及的著作从体系、用语、体例直到读法和参考资料提出有益的指导，而且也间或评论其中利弊，耐人寻思，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到老一辈学者那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卓民先生在复信时，往往为了一段话，甚或一个术语，查阅各种版本。倘手边无书，没有查到，即在信中言明，而不肯含糊过去。他对黑格尔的用语，大多几经推敲，决不望文生解，真可说是“一名之立，旬日踟躇”。这种功夫在今天有些人不屑一顾，甚至轻蔑地加以“繁琐”的恶谥。因此，在一些理论文章中遂造成不求甚解、以讹传讹、概念混乱的种种弊端。我们的通信是私人信札，卓民先生对国内某些哲学家的评语，未遑斟酌用字的轻重，也许未免有欠妥之词。他在一封

信中，曾谈到我国思想史方面的贫乏，勉励我说：“世兄其与我共勉之”的话，至今仍时时促我勤奋，使我对自己的怠惰荒疏感到内心的疚责。后来，我的兴趣转向思想史方面，应该说卓民先生的那句话是起了很大影响的。他的来信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提出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的产生背景，以及中世纪将其普遍化，以致黑格尔对它进行批判时，由于没有究明原委，终未切中肯綮，这些意见颇值得注意与进一步探讨。卓民先生不是孤立地去评价某一观点，而是追源溯流，以明其脉络，殚其统系。这种方法，尤足珍视。例如，他对黑格尔《小逻辑》中的推理理论，就是上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形式逻辑，下及以后发展起来的关系逻辑，从推理理论的流变及其史的发展，把黑格尔的一些观点放在这样背景上进行剖析与评价。这也是值得注意并可资借鉴的。

说来惭愧，卓民先生屡次来信嘱我钻研关系逻辑，但由于当时疏懒和多病，未能抓紧学习，终未入门。如今精力渐衰更不能存此奢想了，辜负了先生生前的殷切期望，每一念及，辄觉怆然。卓民先生指导后学是不辞劳苦，不怕厌烦的。他回答我问题的复信往往多至十纸以上，且正反两面书写，笔画清晰、端正，几乎从无圈改涂抹之处。当时他已年近九十高龄，除了学校交托的任务，始终在从事写、读、译、著工作，从不中辍。他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可以说没有虚掷寸阴。有一次，接到他的复信较迟，读了之后，才知道他有好几天发高烧，已卧床多日，这封信是他起床不久，就连忙作复的。我一边读信，一边感动不已。对照前辈，我愧然觉得自己不能严于律己，以致虚度了许多本来可利用来学习的大好光阴。如今愧恨无及，谨书以自劾，以勉来者。

我以上面简短的话，作为卓民先生遗著出版序言，一方面是对他的纪念，另一方面也把他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勉励后学的精神记录下来，作为我们后学者学习的

榜样。我所接触的老一辈学者大都具有为我辈所不及的这种长处，他们身上的这些优点是应该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王元化

1990年夏改作于沪上清园

中译者前言^①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而康德乃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这是人所周知的。因此，凡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凡是读西方哲学史的人，都力争对于康德的哲学有所认识。当然，要认识康德的哲学体系，西方哲学史一类的书固然可以作为研究康德的入门；然而要认真而具体地知道康德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则不可不读康德的原著。

康德的著作不能说不多，大大小小共有五六十种（杂录、书简和遗书还不在于内），但是其中重要的也不过十种左右。一般人公认，康德哲学思想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他的三部《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读康德哲学原著的人大都从《纯粹理性批判》入手，但是这本书比较难读，能愉快地读本书原德文版的人，国内不甚多。中译本原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仁源本（见《万有文库》），和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的蓝公武本。本译者近年为武昌华中师范学院的讲师和助教讲授西方哲学史，分五个单元，为期四年，而康德哲学是这五个单元之一，占一个学年。学员大都对于哲学有相当的基础，但一般认为胡、蓝两中译本不易阅读，因此增加我讲授的困难，在解释原著时常常和流行的中译本有所出入。适值北京商务印书馆约我再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以就有这本新译的尝试。

本译者对于康德哲学的研究虽历时很久，但是造诣浅薄，外文也不够精通，诚恐对于康德的比较复杂的德文未能正确理解。所以，这次翻译《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是以英人康蒲·斯密（Norman

① 本“前言”原为译者写的“译后记”，出版时改为“中译者前言”。——整理者

Kemp Smith) 1929 年出版的英译本为蓝本,而对照 Benno Erdmann Leibzig 1878 年的德文版和 Ernst Cassirer 柏林 1922 年的德文版,并参考穆勒尔(F. Max Müller)伦敦 1881 年的英译本,以及胡仁源、蓝公武两先生的中译本,旨在于这次翻译中不失康德原书的本意。所以,以“信”为主而尽量求“达”,至于言“雅”,则所未逮。本想多参考其他的德文版和欧洲各国的翻译本,但是本译者藏书有限而借书又不易,所以只限于手边的这几种。

我之所以据康蒲·斯密的英译本为蓝本,其理由有二:(一)我对于英语比较有把握。读德文本时,虽能理解,但稍不留意,便错误难免,而读英文本则言从意顺,没有隔阂。依我的翻译经验,在我译外文时,如作者写作水平远远超过我写这种外文的水平,则我的翻译是有些靠不住的。康蒲·斯密所写的英文,我自感也勉强能够写出,故不难翻译。(二)我所见到的《纯粹理性批判》英译本有三种:(1)迈克尔约翰(J. M. D. Meiklejohn)1855 年出版的英译本,根据原书第二版译出;(2)穆勒尔(F. Max Müller)1881 年的英译本,根据原书第一版译出;(3)康蒲·斯密 1929 年的英译本主要根据原书第二版翻译,而插入第二版所删去的第一版的某些段落,当第二版某些章节完全改变了其第一版的原文时,又将两版的原文一并译出而分别刊出。关于《纯粹理性批判》1781 年第一版与 1787 年康德亲自修订的第二版两者的优劣,在康德哲学研究者中曾有过不同意见,这里不必去考虑这些了。我们知道,康德课堂讲授“纯粹理性批判”的学说为时甚久,据他自己所说,他对于这个问题深思熟虑,不下十有一年,而到了年纪快六十岁时,好像忽然想起他的来日不多,需要把《纯粹理性批判》这书刊出问世,于是在授课之余,一口气只花了四五个月工夫就写出了这部 856 页的巨著,其中欠整理的地方是难免的。第一版刊出后,评论层出,康德都是知道的,为了答复这些评论,他曾在 1783 年出版《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而在 1787 年才刊出这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关于这第二版的修改,康德在序言中说得十分明白,重要的增删是没有